



中国 青年行动者 年度报告

(2019年)

Young Activists Alliance
2020年1月编写

目 录

报告简介.....	1
编者说明.....	4
第一部分 中国青年残障行动者报告	5
一、主流残障组织的转变.....	5
二、新型青年残障组织的诞生和发展.....	6
三、青年残障组织及个体行动者的行动.....	7
四、青年残障行动者的机遇、挑战和出路.....	9
第二部分 中国青年女权行动者报告	11
一、青年女权行动者的群体面貌.....	11
二、青年女权行动者的行动和组织.....	12
三、官方的管控与压制.....	13
四、青年女权行动者的困境和出路	14
第三部分 中国青年劳工行动者报告	16
一、青年劳工行动者的群体面貌.....	16
二、青年劳工行动者的行动和组织.....	17
三、官方的管控与压制.....	18
四、青年劳工行动者的困境和出路	19
第四部分 中国青年性少数行动者报告	21
一、青年 LGBT+行动者及组织.....	21
二、青年 LGBT+行动者的行动.....	22
三、青年 LGBT+行动者的挑战.....	24
四、青年 LGBT+行动者的需求和出路.....	25

报告简介

本报告的研究对象为中国的青年行动者，这里的“青年”泛指 1990 年之后出生的青年人，而“行动者”则是指以各种线上或线下、个人或集体的方式，争取社会、制度或政策的改变，推动社会进步的人士。为了方便讨论，本报告会以各自关注的主要议题来命名不同的群体，包括青年劳工行动者、青年性少数行动者、青年残障行动者、青年女权行动者等。当然，各个群体之间的界限并非绝对，群体成员也会出现一定程度的交叉和重叠。

内容方面，本报告按照群体的不同共分为四个部分，每个部分均涉及四个方面的内容，分别是青年行动者整体面貌和群体构成，青年行动者 2019 年开展的行动和现存的组织形态，官方在制度和手法上对青年行动者的管控和打压，以及发展公民社会和推动社会进步的角度看青年行动者及其外部支持者未来可以努力的方向。

四个部分均由各议题领域的行动者或观察者撰写，以下为内容摘要。

中国青年残障行动者

近些年来残障组织的生存状态可总结为，权利型组织几近覆没，仅存的组织将政策倡导的工作重心转移向社区组织实践；主流残障组织以基金会、社会企业、服务型企业的样态开展工作，工作的主要方式为培育基层组织、进行媒体传播和公众教育、为企业和雇主提供直接就业服务。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之下，许多青年残障者开始探索以多样化的组织形式来探讨残障群体权利和进行权利倡议，比如拥有 700 多位活跃线上社群成员的线上青年残障组织 S 和中国首间鲜明强调“残障”和“女性”双重弱势身份的公益机构 B。

2019 年，青年残障者和组织行动的主要方式是，通过展览、舞台剧、广播、新媒体、口述史、纪录片等方式讲述个人和群体的生命故事，从而激发群体的身份认同和进行公众教育。同时他们也会在具体权利议题比如高校硕士招生歧视听障人士、教师招聘歧视视障人士上面进行个案支持和政策倡导。另外，B 组织在 2019 年发布了中国残障女性需求报告，报告呈现了职场无障碍环境不完善、招聘差别对待和同工不同酬等就业歧视，以及受教育权利的支持不足等问题，为政府部门支持和完善助残公益服务提出了一系列建议。

虽然政府允许民间独立力量生存的空间日益狭小，但青年残障行动者个人却鲜受来自地方政府或所在高校的管控，主要原因是他们的行动方式主要是线上而非线下，当局倾向于把残障群体的诉求当作福利性需求而非权利性需求，同时当局也倾向于采用可持续发展目标而非人权标准的话语框架去看待残障议题。对青年残障行动者来说，不易的成长经历让他们对于政治风险和外部支持都比较警惕。虽然青年残障组织大多面临资源匮乏的问题，但资金支持未必是对青年残障者的最好帮助。外部可以通过技能培训的方式，让他们可以更好的运用故事讲述和基础调研的方式去行动。

中国青年女权行动者

2019年，中国官方沿用并加强了对于青年女权行动者的管控手段。最频繁使用的手段是通过警察和国保部门对行动者周围的人员进行骚扰，包括房东、父母、亲戚等。除了骚扰周遭人员，对女权行动者本人的约谈和施压的强度也大大增加。2019年新增加的管控手段还包括在行动者居住的小区、电梯口等地方设置监控摄像头，以此进行行程和来往人员的监控。2019年最值得注意的管控方式是对有行动导向的个人和组织进行针对性的打压，通过密集的骚扰，将女权行动者的组织打散，让组织消失，让个人处于孤立的状态。比如Metoo运动之后对相关组织的有针对性的施压、在舆论上进行污名化，让很多机构被迫纷纷关停。

相较于2015年前的高调挑衅，如今的环境让行动者的行动策划和组织动员被迫变得更加低调和分散，这也使得大家调整了策略。在行动动员层面，大规模动员异常艰难且风险巨大，不过行动者们依然会抓住时机果断出手。2019年关于性骚扰、家庭暴力等议题的热点事件依然频发，行动者们会积极跟进事件，通过线上直播、及时组织线上讨论的方式来深化社群和公众对这些议题的理解。她们也会通过撰写文章、制作电台节目、录制音频课程的方式来理清论述、深化讨论，还会通过许多跨组织、跨领域合作的尝试，来重新整合资源和开拓新空间。在具体的性别议题操作层面，女权行动者在就业性别歧视、单身女性生育权、性骚扰三个特定议题上面进行了深耕。在具体的个案跟进方面，行动者们采取了两种策略。一是继续通过扩大个案的公众影响和法律影响来提高公众意识和推进政策和法律的改变；二是提供具体的、陪伴的个案服务。在社群建设方面，虽然很多城市的线下活动频频遭遇阻挠，但是行动者们还是探索出了许多创新的方式让青年女性形成线上和线下的联结。另外还有许多行动者在海外培育中国留学生社群用以回馈中国的女权运动，其中一些人在反性骚扰运动当中组织了大规模的动员活动。

中国的青年女权行动者亟需得到来自各方的支持，主要是三个方面：一是资源和资金的支持，让运动可持续，让行动者不再处于脆弱的处境当中；二是对于行动者心理健康资源的投入，让行动者可以及时处理政治创伤，找到动力继续开展工作；三是安全和风险方面的支持，让加入运动或者想要加入运动的行动者可以获得比较充足和完整的安全培训，在将来的工作当中可以有应对的方法和预防机制。

中国青年劳工行动者

在2018年佳士工学运事件后，高校左翼社团受到了严重摧毁，可以说是“连根拔起”，左翼青年也被公安和学校作为重点关注对象予以全方位管控，有的甚至还遭到刑事抓捕。除此之外，约谈、要求删除在社交媒体发布的文章和言论、进行思想教育等管控手段也都继续得到沿用。高校也越来越普遍地利用科技手段和学生力量去实现其管控目标，比如人脸识别系统和学生信息员制度。在高校以外，打压逐年升级。2019年被官方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名关押的劳工人士的人数比过去任何一年都要多，很多劳工机构被迫关闭或转型。

在这样的政治环境之下，“沉寂”可谓是左翼青年2019年后半年的主要生存状态。他们很少参加公开活动，即便参加左派或劳工的活动，也会以化名出现。这样做虽然可以保护他们在有限的空间里存活下去，但同时也使得他们与外界隔绝。从组织形式来看，高校左翼社团受到打压后已经不能继续以社团名义在校内公开举办活动，但仍有少数学生在校外举办学习

小组或低调进行各类活动，比如为学校附近的工人举办文娱活动、法律讲座，利用寒暑假进入工厂打工并开展调研、组织工人工作。另外也有一部分刚毕业的青年人选择加入官方的工会系统，一方面了解它的运作，另一方面尝试去改变工会不为工人办事的现状，不过他们最终都因为受到工会的种种限制而选择离开。非左翼青年方面，有专职工作的人会利用业余时间持续而深入地参与具体公共事件，在校学生则会通过实习、兼职或志愿服务的方式参与劳工机构的工作。

如今，很多劳工机构不能够再以组织的名义开展工作，而只能以个人名义、非公开的形式。这样的变化导致劳工机构和青年行动者互相看不见，结果是青年行动者的参与途径比以往减少，获取相关资讯变得更加困难，无形之中为青年行动者的参与增加了障碍和门槛。因此，未来一个可以努力的方向是让青年行动者和劳工机构多一些正式或非正式的联结。另外一个发展方向是搭建更多平台将劳工议题和其他议题的行动者联合起来，跨领域的交流和学习将有助于劳工议题的行动者从自我封闭的隔绝状态中走出来，也有利于意识和能力的提升。

中国青年性少数行动者

LGBT+青年行动者大致可分为两类，一是在校参与校园同志小组的大学生，二是参与到民间同志机构志愿者的大学生和刚毕业不久的在职人士。根据对中国 50 个高校同志团体的调查，校园青年 LGBT+ 团体目前主要以某一高校独立运作的学生小组为主，其中也有 14% 为跨校的联合小组。它们中有 80% 成立于近 5 年内，主要集中在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和武汉、西安等城市。在 50 个高校同志小组中，不到一半的同志小组在校园里能与其它学生社团一样顺利注册，多数小组无法注册或注册后被强制注销。由于没有社团的“合法”身份，他们在校园里开展活动遇到较大的阻力，无法公开在校园里招收新成员，无法使用校园教室举办活动，无法在校园内举办讲座或大型活动，否则会面临被辅导员或团委老师约谈的风险。

在面对各种外部压力的情况下，青年 LGBT+ 行动者及其团体仍大量坚持着校内外的行动组织及参与，活动内容包括同志学生社群发展、公众教育/知识普及、性与性别相关的研究、议题政策倡导、学生团体网络支持等。比较突出的是，青年人十分擅长通过网络介入公共议题，并有意识地利用个体行动带动公众参与。比如，在 2019 年 11 月的《民法典》同性婚姻倡导行动中，大量参与动员的志愿者均是在各同志机构充当志愿者的年轻人。他们一方面利用自身在网络上的传播技能进行网络动员，另一方面在线下带动更多在地社群参与，最终带动了 18 万 8 千多人参与到该立法过程中。这在中国同运参与立法的历史上是重大的突破，许多参与者表示，这是他们有生以来第一次参与中国的立法进程。

随着公民社会行动空间日益收缩，许多 LGBT+ 公益机构的活动受到较大影响，各机构均采取较为保守的行动策略，少有过去几年较公开的倡导行动。低调开展工作的影响之一便是青年行动者的参与缺乏成熟的平台。因此，在未来的时间里，外界支持者需要搭建更多青年行动者与同志 NGO 互动合作的平台。同时，面对有限的空间，需要培养青年行动者持续深耕具体议题的心态，提升他们对大陆同志运动历史和现状、所处社会及政治环境、具体同志议题的认知，培养他们在充满冲突和割裂的社会及运动文化之下开展对话、协作讨论的能力，并创造更多行动者之间相互陪伴和支持的机会。

编者说明

本报告的编写初衷在于帮助外界全面了解中国各领域青年行动者的行动和组织状况，以及当下面临的挑战和困难。不过由于人力和资源有限，本报告暂时无法涉及所有领域的青年行动者。对于这一局限性，我们十分希望往后的年度报告可以得到加强和补充。如对本报告有任何疑问或意见，欢迎致信 youngactivists20192019@gmail.com。感谢您的阅读！

第一部分 中国青年残障行动者报告

作者：中国残障运动观察者

近些年来，中国政府对民间社会尤其是权利组织的打压，无疑造成了残障权利行动的空间紧缩。与此同时，也有越来越多青年残障者开始探索以多样化的组织形式来探讨残障群体权利和进行权利倡议。本报告将主要分析两个由青年残障者成员构成的残障组织及其核心成员的行动，一个是拥有 700 多位活跃线上社群的线上残障组织 S，另一个则是正式注册的、关注残障女性的公益机构 B。同时本报告还将涉及在本年度内有广泛影响力的青年残障者行动。

一、主流残障组织的转变

2015 年之后，包括北京益仁平中心在内的多家权利倡导机构迫于政治压力而解散，唯参与中国《精神卫生法》修订的深圳衡平机构未遭此厄运。衡平机构的工作重心亦由在立法和司法层面倡议精神障碍者的自主决策权，转向参与和支持精神障碍康复者的社区融合实践。曾深度参与倡导行动的四位青年残障者，则结成相对松散的倡导团队，在 2015 年之后推动残障者参与各类任职考试的平等权利，通过微信公众号“残障之声”进行媒体传播和线上社群动员。曾在北京益仁平中心及分支机构任负责人的程渊，组织和搭建了“残障律师团”，由十几位律师（近半数为残障律师）接听各地残障者咨询热线，也为残障倡导团队的当事人提供法律援助。2019 年 7 月，程渊以涉嫌“颠覆国家政权罪”被刑事拘留，残障倡导团队和“残障律师团”均受到波及。

此外，“老牌”的残障组织在近年来经历了转型。在 2012 年作为 NGO 代表向联合国 CRPD 委员会提交影子报告的“一加一”，成立了一加一残障人公益集团，分支“有人基金会”和社会企业“其实咨询”等。前者为基层社群组织提供 CRPD 推广和培训，并与哈佛大学法学院和中国人民大学有深入合作，向正式注册的基层残障组织提供小额项目支持；后者则主要为视力障碍者提供就业服务。2009 年工商注册的、致力于开展法律服务项目和无障碍倡导工作的“亦能亦行”，于 2015 年前后淡出。2016 年，其发起人张巍成立了提供融合教育咨询的社会企业，其核心成员吕飞则创办企业，为雇主提供残障者岗位开发、无障碍环境改造等支持。

2014 年，瓷娃娃罕见病关爱中心借“冰桶挑战”风靡之机转型成立病痛挑战基金会，主要关注罕见病的医疗康复权利。他们在各地培育了一些罕见病病友组织，也通过影视和剧场等形式进行公众教育，增强社群的自我接纳和自我认同。

原武汉大学公益法律中心，曾以法律培训和法律研究方式与民间权利型组织合作，2018 年其负责人张万洪教授当选中残联权利委员会主任，并作为国家代表参与政府间残障议题的对话，参与起草 CRPD 国家报告、国家人权报告残障的相关章节，负责中残联的残障就业修法的论证工作。残障权利有了官方和民间对接的桥梁，但尴尬的身份又限制了该组织的独立发展。

综上，残障组织的生存状态可总结为：权利型组织几近覆没，仅存的组织将政策倡导的工作重心转移向社区组织实践；主流残障组织以基金会、社会企业、服务型企业的样态开展工作，工作的主要方式为培育基层组织¹、进行媒体传播和公众教育、为企业和雇主提供直接就业服务。新的青年残障行动者和残障组织，就是在这样的土壤之上诞生和发展。

二、新型青年残障组织的诞生和发展

从线上到线下：*S* 组织的诞生和成长

2016 年，曾有癫痫体验的、海外残障学在读博士 Y 在社交媒体知乎创办“残障学讨论”专栏，希望为社会大众提供自闭症康复、海外残障研究等资讯。Y 选择这一平台的其中一个原因是，知乎的主要受众为青年人，且有高等教育经历的用户占有一定比例。Y 发布的专栏文章对大众传媒中对残障者“同情、可怜、励志”单一视角的反思、对残障社会模型的解读，击中了一些具有同样生命经历、懵懂中亦在困惑的残障青年，其中也包括高中生。很快地，专栏吸引了几位早期的核心成员，也建立了有更多互动可能的微信群 S，团队核心成员开始运营微信公众号。

知乎专栏的文章内容，既包括国外残障权利运动历史的介绍，也包括社群成员基于自身体验、反思的随笔和残障视角下的影评。而微信公众号的内容几乎都是原创，既包括辅具选择、出行建议、专业报考建议等贴近生活和学习需求的资讯，也包括针对一些时事和热播影视作品的残障视角分析。散落在各地的残障者发现了一群有类似生命经历的少数派，好像突然“找到了组织”，觉得自己不再是异类。

在组织创办初期，成员间对于自我接纳、自我认同的互相鼓励，对于权利、现状、自我认同的深度讨论十分激烈。这种活跃的组织给了成员归属感，朋辈的支持也给因现实处境而长期自卑、怯懦的成员以信心和身份认同感。“残障之声”主笔 X 也是 S 社群的活跃成员之一，他坦言，“S 组织改变了我，让我真正开始自我接纳，开始放飞自我。”而初期他在群组中关于权利倡导的一些言论，引起谨慎的核心成员的排斥²，X 曾被误会号召上访而被踢出群组，在核心成员调查和了解后才被请回。如今，X 个人和 S 社群的核心成员是熟识的好友，残障权利倡导的行动对 S 社群也逐渐产生影响。

到 2019 年为止，S 组织已有 700 多位活跃线上社群成员，其中约有一半是残障大学生，也有研究者和公职人员，比如地方残联工作人员等。S 组织的核心运营团队都是肢体障碍者。从高中开始深度参与的 Q，目前正在读大二，是高考合理便利——为书写不便者延长考试时间——的首批受益者；学习 IT 专业的 H 今年准备考硕士研究生；公众号编辑 N 因为重度肌肉萎缩而导致严重的身体障碍，在家和外出有专门的陪护者，因为身体原因她没有进入主流的学校接受教育，但她的文笔被社群公认为“温柔而有力量”。另外还有几位核心成员，有的在做程序员，有的则是在跨国企业工作，他们都是在工作之外兼职参与。

¹ 受法律政策制约，基金会的主要支持对象为正式注册的基层残障社群组织，而大量的基层组织无法成功注册。

² 微信群主对群聊内容的政治合法性承担责任。

由于社群成员有很大比例的肢体障碍者，尤其是使用电动轮椅出行的“重残”者，群体的无障碍诉求很明确。在成立的第一年，S 组织就针对高德地图缺乏无障碍设施标识而征集到 337 位社群联署提建议，高德公司迅速做出了回应，并开始在软件中标识了无障碍设施。S 组织成员初战告捷，备受鼓舞。

随着社群规模的扩大，核心成员对社群发展也逐渐有了更清晰的管理章程和发展规划。加入 S 组织的微信社群，需要填写申请表，核心成员的变更需要其他核心成员的同意，群组讨论也有明确规则。除了群组讨论，S 组织还有固定的圆桌分享活动。S 组织邀请嘉宾，在微信群里文字直播课程，内容包括创业和就业经验、独自出游的经验等主题的分享和答疑，同时也包括一些权利理念分享和权利行动经验总结。

在充分的线上交流和固定的线上活动之外，S 组织还会举办每年一度的线下周年庆典和小区域内的线下聚会，所有费用均自费、AA 制。线下聚会对于重度肢体残障的成员而言是一种挑战，既要冲破自我认知的限制和对未知环境的恐慌，又要应对家庭出于担忧和不信任的阻拦。在 S 组织核心成员、自高中就开始深度参与 S 组织运营的 Q 看来，社群成员独立出门和大家见面，本身就是一种能力和权利的觉醒和突破。同时，在公共空间里同时突然出现十余名电动轮椅使用者，这对于公众的观念来说也是一种冲击。

S 组织的线下活动，曾有一次获得广东某地残联的支持。残联的要求是将活动冠名在残联之下，但这被 S 组织的核心成员拒绝。“有人基金会”也曾有意要支持，但 S 组织的核心成员始终坚持组织的独立身份，“我们现在自己出钱也挺好的，不想被‘孵化’或者‘收编’。”³

多重身份的首次呈现：B 机构的创立和发展

90 后残障女性 J，大学毕业后曾在“有人基金会”工作过一段时间。J 和另一位因罕见病而受障的大学毕业生 Y 一起开始筹备公益组织 B，这是国内第一次有民间组织鲜明地强调“残障*女性”的多重身份和因此遭遇的多重障碍。

2018 年底，B 组织推出了线下残障女性影像展，将十余位残障女性的个人肖像、生活经历以可视海报、简短文字的形式公开展出。这是中国民间组织第一次正式地公开强调残障女性这一特殊的群体身份标签，在残障领域引起了一次不小的轰动。

2019 年 3 月，B 组织终于成功注册为社工组织，聚焦于残障女性群体。B 机构的成员、实习生，大多是 90 后的残障女性，她们以新媒体为传播平台，尝试在女性主义视角下解读女性残障者的生命经历，同时也持续在做残障女性口述史的记录和编撰工作。B 机构也和关注女性反家暴议题的法律服务组织、做残障女性社群培训的 P 基金会有多种形式的合作。然而，虽然正式注册，资金筹措对 B 机构来说仍然是一个不小的挑战。

三、青年残障组织及个体行动者的行动

³ 来源于与 S 组织初创期核心成员 Q 的采访。

S 组织：媒体倡导更进一步

四川大学 2019 年的硕士研究生招生简章明确表明，因无法提供相应支持而拒绝聋人考生报考。S 组织的社群看到招生简章后，当即向四川省残联电话投诉，同时也在社群里号召其他成员去电话投诉。Q 同学也告诉了自己的老师，老师随后联络到中残联的朋友来协调解决。迫于各种压力，招生简章里的那句话一天之内即被删除。通过老师的介绍，Q 同学认识了中央广播电台的师兄，接下来将和师兄的电台节目进行合作，由 S 组织收集和编辑残障者的故事在国家级的电台节目播放。

B 机构：从故事呈现到需求调查

在收集社群故事和参与组织线下培训之外，B 机构的创始人 J 也和同样关注残障女性的某基金会合作，进行了残障女性需求调查，收集到了几百份问卷，并在国际残疾人日发布了中国残障女性需求报告。⁴ 报告呈现了职场无障碍环境不完善、招聘差别对待和同工不同酬等就业歧视，以及受教育权利的支持不足等问题，为政府部门支持和完善助残公益服务提出了一系列建议。

青年残障者个人的抗争和发声

在组织行动之外，回顾 2019 年对整个残障领域影响最大的几个事件，其中也有青年残障行动者个人的身影。首先是两名盲人青年对抗教师招聘的直接歧视，以下是他们的行动概况。

盲人青年郑荣权，通过 2015 年第一届盲人可以平等参加的普通高考进入大学，2019 年毕业后即考取了浙江省教师资格证。他参加了南京市某盲校的教师招聘，笔试面试均名列前茅，但最终因为体检不合格被拒。⁵ 郑荣权联系了“有人基金会”寻求帮助，他们联络到了中残联和江苏省残联，为他入职一事和盲校协调。事件被主流媒体广泛报道，也被央视新闻专访报道。最终，郑荣权进入盲校教书，个案获得解决。但此事并未撼动南京市的教师招考体检标准，或许郑荣权本人也无意去担当“前驱者”的角色去争取制度性的改变。据了解，他本人认识残障自倡导团队，但并未向他们求助。有了解浙江省教师资格证考试标准的人士认为，按照浙江省的标准，郑荣权应该没有考教师资格证的资格，因为也会被认定为体检不合格，他最后拿到了资格证，应该也是某种“特事特办”。

另一位在 2019 年挑战教师招聘体检标准的是女大学生王香君。她是安徽省第一位通过普通高考进入大学的盲人大学生。⁶ 同样因为被认定为体检不合格，她应聘特殊教育学校音乐教师被拒。她向残障倡导团队求助，希望以个案推动体检制度的改变。教师节时，倡导团队协调了联署建议的活动，这个曾经被权利型 NGO 常用的方式，在主流媒体最终的报道里，却

⁴ 正午故事：《国际残障人日：不让一个残障女性落下，残障姐妹们有建议》，2019-12-04，<http://dy.163.com/v2/article/detail/EV19M5G00534A4SE.html>

⁵ 民主与法制时报：《温州视障大学生郑荣权坎坷求职路：入职考试第一仍“不合格”》，2019-05-03，<https://new.qq.com/omn/20190503/20190503A08MBB.html>

⁶ 中国日报：《我从未见过光明，可我见过爱——安徽首位盲人高考生圆大学梦》，2015-07-16，http://www.chinadaily.com.cn/micro-reading/interface_toutiao/2015-07-16/13991157.html?tt_group_id=4727354414

不再被提及。像媒体报道其他和残障有关的事件一样，她的成长和求学经历才是媒体报道的重点。

同样的经历、同样的遭遇，两位盲人大学生选择了不同的路径去解决。拥抱主流力量，还是信任民间力量？其中原因，当然也包括残障者个人对“维权”风险的考量。

除了争取平等就业权，还有“红到出圈”的青年残障者。

潘潘是一位坐轮椅的90后北漂，也是关注残障女性议题的B机构的公众号兼职编辑，主业是在北京一家医疗机构工作。2019年7月，在“截瘫之家”创始人文军因无障碍设施被占用而不幸去世的事件发生后，潘潘在微博上发起了随手拍的活动，希望号召公众关注无障碍设施的建设和使用情况。小众但口碑甚高的自媒体电台“故事FM”也播放了潘潘的故事。⁷

B站博主大程子在杭州互联网公司工作，她是S线上社群的一员，也参加过“有人基金会”的线下培训。2019年，她在B站业余做直播，展示轮椅使用者的日常，比如如何开轮椅去上班，揭秘康复性医疗手术，也直播无障碍辅具展的现场见闻。因为成了“网红”，大程子被更多残障者认识，也常有人向她咨询和求助。医学科普大号丁香医生为她撰文，让更多读者了解了大程子的故事，也了解到大程子所说的“残障只是另一种生活方式”的理念。⁸

从2019年的行动梳理中不难看出，“讲故事”是当前青年残障者和组织主要的行动方式，也是被主流媒体和公众接受的方式，无论是展览、舞台剧、广播、新媒体推送文章、口述史、纪录片等等，都是在用各种方式讲述残障者个人和群体的故事。

四、青年残障行动者的机遇、挑战和出路

机遇：议题发展空间大，政治敏感性低

虽然政府允许民间独立力量生存的空间日益狭小，但本报告所涉的残障青年行动者个人则鲜受来自地方政府或所在高校的管控。究其原因有三。

首先，因为群体身体特性的原因，残障大学生的行动多在线上进行，很少在同一地区同一高校聚集做线下活动。而S组织的线下活动，常有一半时间是集体出游，不涉行动导向的具体议题，因而在当局维稳的范畴之内。

其次，残障议题本身不敏感。一方面，残障者长期的不利地位，让残障者的发声对官方来说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和合法性。另一方面，中国地方政府向来以发放福利的方式对残障群体及其家庭进行“维稳”，所以当残障者提出无障碍环境、合理便利支持等诉求时，当局更倾向于把它们当作福利性需求而非权利性需求，因而也不会把他们当作上访或其他群体性事件的性质去管控。即便在2019年外部政治环境有变、国内趁机打压权利NGO的情况下，维稳人

⁷ 故事FM：《一个轮椅使用者的独立北漂挑战》，2019-07-15，<http://storyfm.cn/episodes/e241-wheelchair-accessible/>

⁸ 丁香医生：《故事|轮椅少女的飞驰人生》，2019-08-12，<https://zhuanlan.zhihu.com/p/77701775>

员限制某核心残障倡导者出境时提到，“维护残疾人权利没有问题，但不能意识形态出现错误。”

再次，如前文所述，中国政府也会采取一些措施应对下一次国际公约的联合国审议，在可持续发展目标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而非人权标准的话语框架之下，地方政府和残联也在推动相关制度和服务的完善。从 2019 年相关的活动来看，残障议题将来以主流方式推进的机会很大。

挑战：资源缺乏和抗风险能力低

本报告所分析的两间青年残障者创办的自组织均面临资源缺乏的问题。S 组织的年度聚会大部分是参加者自费，仅几千元经费来自“有人基金会”的小额支持，而国内一线城市只有较高档酒店才有无障碍设施，这就使得个人承担的成本较高。另外，相对其他人，青年残障者的求学、求职本来就更加困难，当组织成员大部分都是大学生和刚步入职场的毕业生时，他们不易的成长经历也会让他们对于外部支持、政治风险更加警惕。B 机构也是类似，虽然经过正式注册，但并没有更多的资源进行议题推广的更多尝试。

出路：外界提供技能培训

对青年残障者行动的技术支持可以从技能培训着手，而非资金支持。技能可以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如何讲故事，二是如何做基础调研。

如前所述，当前青年残障者和组织主要的行动方式是讲故事，所以如何讲好故事，或者青年组织如何培训出更多社群成员能够讲出不卖惨、不励志、能体现群体共性的障碍又有趣的故事出来，是十分重要的，而且也需要一些更专业的培训支持。而讲好故事本身，既能促进更多青年残障者自我接纳和自我认同，使群体从身份政治中获得更多能量，正视自己的需求并有力量去寻求改变；同时，也能促进公众的观念转变和意识提升。

青年残障者的意识觉醒后，门槛最低的参与活动便是作基础调研，比如针对当地无障碍设施的调研，尤其是特定公共场合如高校、医院、公共交通的无障碍调研。在未来几年，中央和地方政府可能会主动进行无障碍建设，但这必须吸纳残障者群体的参与，因为只有残障者本身才最了解自己的需求，才最有资格评估设施的设计和建造是否合理，所以这样低门槛的参与也会有一定意义。

第二部分 中国青年女权行动者报告

作者：中国女权行动者张累累

中国青年女权行动者的出现创造了中国女权运动发展的全新景象，但是随着近几年政治环境紧缩、政府管控加强，女权行动者们在个人和组织活动当中都遭遇了巨大的阻力和无休止的骚扰，即便如此，她们依然在夹缝中寻求机会、探索新的出路。本报告首先回溯了这个群体组成人群的基本面貌、探索她们加入女权运动的原因，接着呈现了她们 2019 年主要的行动方式、专注的议题、如何进行社群建设，然后讨论了 2019 年新面临的官方管控如何对行动者开展工作以及女权组织动员社群设置了重重障碍，最后总结出这群行动者如今面临的最大困难有哪些、需要哪些外部支持，以及她们如何把握还存在的机会。

一、青年女权行动者的群体面貌

这群行动者年龄在 22-33 岁之间，成长于从大小城市、城镇、乡村不一的背景，并非都来自中产家庭，不少曾生活在贫困农村。她们绝大部分都接受过高等教育，大学时期也成为接触女权运动的起点。如今的她们，以 NGO 工作者、自由职业者、创业者等等各种身份形成中国女权运动者的核心群体。不同于同龄青年走上的精英路径，她们选择了边缘又崎岖的抗争之路。她们从不同起点出发的经历和探索，成为她们最终走到一起的原因。

虽然大部分行动者表示没有经历过非常“严重”的性别压迫，但是当她们回望过去，还是会发现自己都曾不同程度经历或者目睹过性别不平等的现实，潜意识都存储着这些事实，而女权主义理念的出现让这些事实得到了解释和认知。其中一位行动者在童年时就意识到“女人是没有财产的”，但是不觉得自己除了结婚还有第二选项的她，为自己设定的未来伴侣要求的是“不家暴的男人”⁹。从目睹自己同学父母的重男轻女、家庭里面劳动分工的不合理、遭遇性骚扰，到被异性恋中心的浪漫爱情文艺作品洗脑、各个层面上被规训怎么做才是女生该有的样子，以及加上性别因素之外的阶级差距带来的欺凌、童年经历的家暴，这些行动者都努力地寻求资源和信息去了解世界和追求自己的理想，通过如阅读书籍、参加女权培训或活动等方式，用女权主义的视角理解男权体制下的权力结构。

接受的高等教育为这些行动者提供了工具和信息来源，而这和这一代女性可以接触到更多教育机会有关。近几年的数据显示，高校当中的女大学生比例已经超过 50%¹⁰。她们是一胎生育政策最严格的环境中成长下来的一批人，虽然不能忽视计划生育对女性的残酷压迫和对她们生育权的剥夺等罪恶性，但是某种程度上来说，一胎政策迫使很多家庭将自己的资源投向家中唯一的女性后代，让她们获得了更多机会去获取理念和活动的信息、去争取自己的权利。

⁹ 来自对行动者的个人采访。

¹⁰ 人民网：《女大学生和研究生比例达 51.7% 和 48.5%》，2013-10-28，<http://edu.sina.com.cn/kaoyan/2013-10-28/1125399511.shtml>

在这群行动者的探寻路上，最突出的一点，是她们对理想和价值的追求。她们当中有人从小个性充满抗争性、反对各种对个性压迫的手段、追求人的自由，也有人坚信“人活着就要有理想”、需要寻找“年轻的激情”，有人尝试了主流的精英道路发现并不适合自己，也有人希望自己可以从事的是帮助别人的工作。她们最终在一个充满包容、相互支持和时刻反思的空间找到了自己的使命，从个人政治的实践到公开场域的倡导，她们建立了紧密的社群。和由学者、律师、专家等精英人士形成的老一辈妇女工作者不同，她们相对来自草根、身处边缘，但是极具挑衅性、身体性、批判性和创造性。她们将女权主义带出小圈子，走进主流人群视野，当然也因为其高调的行动方式、组织能力和动员性，让她们在这个各种社会力量都在被打压的时代，经历着各种阻碍和挣扎。

二、青年女权行动者的行动和组织

随着近几年政治形势的恶化，青年女权行动者的活动空间骤然紧缩，2019年也进一步延续着这一趋势。这意味着女权行动者们必须在不停应对政治打压的同时，还要转变行动方式和策略，在有限空间内继续推动性别平等。

在行动动员层面，大规模动员异常艰难且风险巨大，不过行动者们依然会抓住时机果断出手。2019年关于性骚扰、家庭暴力等的热点事件依然频发，行动者们会积极跟进事件，通过线上直播、即时组织线上讨论的方式来深化社群和公众对这些议题的理解。她们也会通过撰写文章、制作电台节目、录制音频课程的方式来理清论述、深化讨论，还会通过许多跨组织、跨领域合作的尝试，来重新整合资源和开拓新空间。比如，2019年在各地举办的中国Metoo展览，就实现了和很多艺术家、策展人的合作，让Metoo运动的历史做了一次档案记录和实体呈现，并且以这种方式继续推动和曝光Metoo运动。又比如，她们和女工小组、各地的小组社团一起组织活动，以此来增进性别议题在其他空间内的可见度。

在具体的性别议题操作层面，女权行动者在就业性别歧视、单身女性生育权、性骚扰三个特定议题上面进行了深耕。在反对就业性别歧视方面，她们通过提供法律援助、个案援助和宣传的方式来推动议题在法律、公众教育和政策上的突破。在中国如今面临人口老龄化危机、需要更多劳动力推动经济的情况下，这个议题具有更多合法性，这从2019年初人社部、教育部等九部门发布通知规定用人单位在招聘过程当中不得询问妇女婚育状况的政策变化上可以看出。¹¹这样的友好政策既是女权行动者的努力结果，也成为她们进一步开展行动的一部分空间所在，让她们在个案跟进上取得了一些突破，获得了包括央视在内的报道资源。单身女性生育权的议题，也因为中国巨大的人口结构压力和较为友好的政策环境，得到了更多的曝光和支持。而像性骚扰这样的议题，虽然敏感度加大，但因为公众认知的提升，它依然有很强的关注度、聚集社群的能力和改变政策的趋势。¹²

¹¹ 中新网：《招聘不得限制性别，不能询问妇女婚育情况！国家九部门下通知了》，2019-02-22，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26139573790430069&wfr=spider&for=pc>

¹² 上海市人大网：《构建“性骚扰”防治机制，上海市人大联合第三方开展立法调研》，2019-04-01，
<http://www.hainanpc.net/hainanpc/xxgk/dwxy/954338/index.html>

在具体的个案跟进方面，行动者们采取了两种策略。一是继续通过扩大个案的公众影响和法律影响来提高公众意识和推进政策和法律的改变。通过提供法律、心理、传播等资源，行动者们跟进了包括职场女性生育被用人单位歧视、职场性骚扰、单身女性生育遭到歧视和拒绝在内的个案，其中有些实现了突破。¹³二是提供具体的、陪伴的个案服务，比如对家暴受害者的支持和陪伴，通过一起去医院、报警让受暴妇女得到最大程度上的支持，也可以改进警方、医院在处理家暴案件方面的性别友好度。

在社群建设方面，虽然很多城市的线下活动频频遭遇阻挠，但是行动者们还是探索出了许多不同方式让青年女性形成线上和线下的联结。比如，通过女性领导力培育、建立女性共学社区、推出女权课程等形式，以一种更加具有合法性的方式，让社群间对女权议题的讨论可以更加深入和复杂化，也增进彼此的联系。另外，她们也通过登山、徒步等各种方式，在线下空间被压缩的情况下，另辟蹊径，将女权议题加入进去，让大家面对面地进行讨论。原有的线下活动和戏剧演出等在合适的情况下依然在进行。另外值得一提的是，许多行动者在海外培育中国留学生社群，通过戏剧演出、工作坊、讨论会等形式对海外的留学生进行意识提升和培养社会运动意识，用以回馈中国的女权运动，其中一些人在反性骚扰运动当中组织了大规模的动员活动。

相较于 2015 年前的高调挑衅，如今的环境让行动者的行动策划和组织动员被迫更加低调和分散，这使得大家调整了策略。首先，大家投入到更加深耕的工作当中，包括对议题讨论和倡导的深耕和对行动者培育的深耕，使得性别平等在政治环境继续恶化的情况下还能保持推动改变，并且培育更多的行动者去组织更大规模的动员。其次，多年在运动当中的磨练也让这些行动者具有独立培育社群的能力，即便被迫在物理空间上分散化，许多行动者也持续地在各自所在区域进行社群培育。再次，环境的变化让行动者们可以突破原有圈层，和更多不同人群进行互动，也在尝试重新定位自己在运动当中的身份、重新定位议题的走向。

三、官方的管控与压制

从高校的管控来看，对于教师和学生的控制更加严格，因此高校的活动与思想传播空间不断被压缩，学生的参与也更受限制、风险也因此增加。其中有在校的行动者在跟妇联接触和试图就具体议题进行沟通的过程中，被妇联的人员向其学校举报，并受到指责和批评。

然而这批青年女权行动者大多已经离开高校多年，所以更紧密和频繁的监视和骚扰多集中在非高校的核心行动者身上。中国官方对于女权行动者的管控手段在 2019 年是这几年的延续和加强。最频繁使用的手段是通过警察和国保部门对行动者周围的人员进行骚扰，比如骚扰房东试图让行动者被迫迁离原来的住所，甚至通过频繁的、无法摆脱的骚扰，让行动者搬离原来居住的城市。今年更常用的手段还有骚扰行动者的原生家庭，通过激起行动者父母和亲戚的恐惧来让家庭对行动者进行控制，常用的手法是情感绑架，甚至有人身控制的情况出现。

¹³ 全国总工会：《上午查出怀孕下午就被炒，法院一审这样判！》，2019-11-17，https://mp.weixin.qq.com/s?_biz=MzI0MzU3OT15Mw==&mid=2247501504&idx=2&sn=f628bccf1df2ec4fdf0d546042df414e&pass_ticket=5rjXDEvUnyeWTUZUKPSmxF%2BxJNHeJAJJ%2Bm1VwF6Zsk4nCcQCzSo%2FjYWFaY%2F6rfgx

除了骚扰周遭人员，对女权行动者本人的不断约谈和施压的强度大大增加。在 2019 年下半年，大部分核心行动者都有不断被约谈，各种个人和工作上的活动都不停被限制的情况。今年新增加的针对女权行动者的管控手段还包括在行动者居住的小区、电梯口等地方设置监控摄像头，以此进行行程和来往人员的监控。随着监控技术的发展和不断被使用在管控上面（如人脸识别技术），行动者的行踪和个人信息都更加容易被实时掌握，警方就更容易针对行动者的行踪变化针对性地实施骚扰。

除了行动者个人不断被骚扰，线下和线上的活动空间也不断被压缩。除了紧密监控核心行动者发起的活动并立即设置阻碍，很多文化空间和场地也处于持续被监控当中，特别是会组织相对“敏感”议题活动的场地。加上许多文化空间在逐步被关停，行动者开展活动、寻找空间的难度大大增加。线上空间方面，审查在不断严格化、细节化，长期的审查和限制甚至形成了一种不再容易引起异议的常态，行动者们会通过使用各种方式传播从而拉长内容的存在周期，但是一些相对“敏感”的话题的存在时间仍然不容乐观。

2019 年最值得注意的管控方式是对有行动导向的个人和组织进行针对性的打压，通过密集的骚扰，将女权行动者（也包括其他社会力量）的组织打散，让组织消失，让个人处于孤立的状态。Metoo 运动之后对相关组织的有针对性的施压、在舆论上进行污名化（列为非法组织等），让很多机构被迫纷纷关停。而对于剩下的组织，官方则会针对具体的人员不断进行骚扰，让行动者处于非常脆弱和被动的处境当中，很多行动者最后只能搬离所居住的城市。虽然这些行动者依然在保持相互的支持，以及会在新的城市展开活动，但是这种打散式的打压对于运动还是造成了巨大的损失和阻碍。

这些打压手段对行动者的个人和工作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不断地搬离、时不时地被侵扰，让行动者们最基本的居住安全、作息安全都会受到很大的影响，与原生家庭关系紧张会给个人带来许多压力和张力。这些方面都对许多行动者的心理健康造成了很大的困扰，恐惧、抑郁和愤怒会成为经常出现的情绪。除此之外，行动者的工作被常常干预，许多活动都在开始前或者中途被打断，也给部分行动者带来工作的犹豫，产生一些自我审查。另外，由于行动者和女权运动不断被官方敏感化、边缘化，很多行动者的身份变成“负资产”，在吸引社群的过程当中产生许多身份上的焦虑，很多资源也因为这样的身份而不会流向至女权运动当中。许多新社群虽然有巨大的行动热情，但安全信息和培训资源的缺乏也给个人和运动留下一些后患。

四、青年女权行动者的困境和出路

青年女权行动者目前主要面临三方面的困境。首先，因为打压，行动者被迫分散在各个城市，并且需要以更加个人化（非组织、机构化）的方式开展活动，这给行动者们带来了非常大的挑战。个人行动者的身份无法获得更多资源，个人行动者建立社群也面临很多身份上的合法性的困境，同时个人还需要付出比之前更多的精力和时间在运动当中，从而也会相较于之前处于更加脆弱的地步。其次，因为对于境外资金的严格管控，以及身份上的敏感性不容易获得境内的资金，许多行动者和组织都面临着缺少资金的情况。再次，虽然中国对女权具有

兴趣的人群基数非常庞大，但是舆论环境的恶化使得许多女权群体被导向至更加简单化、极端化、情绪化的讨论氛围当中。

鉴于此，中国的青年女权行动者亟需得到来自各方的支持。一方面是资源和资金的支持，让运动可持续，让行动者不再处于脆弱的处境当中；一方面是对于行动者们的心理健康资源的投入，让行动者们可以及时处理政治创伤，找到动力继续开展工作；另一方面是安全和风险方面的支持，让加入运动或者想要加入运动的女权主义者可以获得比较充足和完整的安全培训，在将来的工作当中可以有应对的方法和预防机制。

虽然面临着巨大的困境，中国的女权运动以及其中的行动者们还是可以看到一些机遇和出路。第一，一些性别议题的正当性和合法性使得开展工作依然存在着空间，在很多领域都缺少资源和投入的情况下，这些议题在填补着中国性别议题发展的空白。第二，虽然社群培育的难度加大，但是对女权工作具有热情的青年女性不在少数，提供适当的机会，并投入时间培育，将会增加女权运动的有生力量。第三，虽然女权和行动主义被污名化和敏感化，将一些议题和主题进行变体，或者开拓新的话题，比如开展女性领导力、性教育、女性心理健康、女性健康等话题的活动，还是可以创造不同的可能性。第四，孤立和分散的处境尽管难以避免，但是也促使行动者们走出安全区，进行更多领域的合作，摆脱原有的工作模式创造更新的行动方式，走出原来所在的区域在各个区域继续开展社群的挖掘。

第三部分 中国青年劳工行动者报告

作者：中国劳工运动参与者

2019 年是中共建国 70 周年，这对于现政权的存续具有重要意义。同时，2019 年也是五四运动 100 周年，五四运动的发源地就在中国高校中首屈一指的北京大学。在这样的两个关键时间点，为防止任何“不稳定因素”的干扰及蔓延，当局对青年行动者的打压升级势在必行。因此，2019 年对于中国的青年劳工行动者来说，可谓是“夹缝中求生存”，实为不易。本报尝试梳理青年劳工行动者在 2019 年的行动状况和组织形态，以及面临的困境和挑战，同时指出未来可以努力的方向。

一、青年劳工行动者的群体面貌

这群青年人，从 1990 到 1998 年出生的都有，非常年轻、有活力。他们有的来自城市的中产家庭，大多是家里的独生子女，父母是教师或公务员。他们成长于相对自由的家庭环境，早期对于工人现状了解不多，也没有觉得工人跟自己有什么关系。但从开始参与学校的“校工调研”活动后，他们就发现自己的生活其实从来就离不开工人，每天都在享用他们提供的各种便利服务。同时，他们也意识到，虽然自己的父母不是工人，但其实很多亲戚也在外打工，但以前从不曾了解他们。

还有更多青年劳工行动者来自普通家庭。他们的父母有的做小摊贩，有的在工厂打工，也有的来自三线沿海城市（比如湛江、茂名、潮汕），以种植和捕渔为主业，也有的在码头做维修工人。因为父母外出打工，他们从小就跟着爷爷奶奶、外公外婆长大，与父母聚少离多，可以说是留守长大的一代。也有一些青年人跟随父母到了城市，在城市出生、成长。他们从小在父母的三轮车上、菜摊上过着黑白颠倒的生活。¹⁴ 在这样的环境中成长的青年人深刻明白从外地到城市讨生活需要克服的困难有多大，生活有多艰辛。不过无论是留守一代或是流动一代，他们的成长经历都有利于他们理解工人群体。

这些青年劳工行动者还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都接受过或正在接受高等教育，他们中有不少就读或毕业于名校，或者有海外留学的经历。有意思的是，他们参与到劳工工作的契机和理念却并不一致，从参与动机来讲大致可以分为四类。第一类青年人参与劳工工作与他们就读的专业有关。比如学习社会学、社会工作专业的青年人在学校学习到社会结构、社会阶层相关的概念后，相信社会阶层存在巨大的不平等，而且这种不平等具有普遍性，但是这种不平等是可以被改变的；而学习法学和新闻学专业的青年人，因为在实践中有机会接触到工人相关的素材，所以对工人的权益状况会更加了解。第二类青年人则受左翼思想的影响较大，他们学习马列主义，觉得青年人应该关心国计民生，关心工农兄弟。第三类青年人觉得大学校园的生活太无聊，想找点事做，所以跟同学、学长参加校外的公共活动而慢慢参与到一些行

¹⁴ 菜摊一般凌晨 4 点开始营业，所以凌晨 3 点多父母就得去菜市场做准备工作，小孩困了就直接睡在三轮车上。

动里面。最后也有一些是想为之后找工作或深造、增加个人履历资本而以实习生或者志愿者的身份参与一些劳工机构的工作。

从参与程度来讲，可以分为两类青年行动者。受左翼思潮影响较大的青年人参与得更深入，他们会将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行动的理论支持，而且整个群体有相对稳定的网络和组织。另一类是“非左翼青年”，他们关心社会，关心弱势群体，关心社会不公，希望追求民主自由。这一类青年的行动比较个人化，会因为参与具体的事情而结识，事情结束后彼此之间只会有松散的联系，因而整个群体没有明显的组织网络和群体领袖。

二、青年劳工行动者的行动和组织

左翼青年

从外部来看，“沉寂”可以说是左翼青年 2019 年后半年的主要生存状态。他们很少参加公开活动，即便是参加左派或劳工的活动，也会以化名出现，就连关注劳工议题的资深人士也很难接近他们的核心成员。这样做虽然可以保护他们在有限的空间里存活下去，但同时也使得他们与外界隔绝，进一步陷入一种孤立的状态。

从组织形式来看，高校左翼社团受到打压后，目前已经不能继续以社团的名义在校内公开举办活动，但仍有少数同学通过一对一私信邀请的方式在校外举办学习小组。学习内容涉及三农、国有企业、民族问题、工人问题、民主，以及包括医疗、教育、住房在内的民生问题。学习小组也会就当下的时事热点开展讨论和专题学习。这些青年熟读《资本论》、《共产党宣言》、《矛盾论》等一系列马恩毛的著作，也研究中国工运的历史。他们还通过观看世界各地与工运相关的影视作品来学习如何做工人的组织工作，比如韩国的《购物车》、《全泰一》，英国的《达格兰制造》和阿根廷的《工人当家》。

尽管只能以非公开的形式存在，但他们仍然会开展各种活动。在周末和晚上的时间，他们会去学校附近的建筑工地或为外来工提供服务的社区机构，为工友放电影、讲新闻，辅导外来工孩子的功课。寒暑假的时候，他们会为外来工的子女举办冬、夏令营，与工友聊天访谈，进行卫生、法律知识普及等。另外，他们还会利用寒暑假时间进入珠三角、长三角地区的工厂打工。他们选择的企业一般都是比较大型和知名的企业，比如深圳的富士康、惠州的伯尔尼厂、苏州等地的知名企业。在工厂打工的时间里，他们会与工人们聊天、交朋友、做访谈，了解工人真实的生活状况。他们还会为某些行业工人开发专属的手机 APP 或小程序，目前已有 5 万活跃用户。有一些青年人还选择进入工厂当一名工人，与工人一起生活、学习、工作，在工厂里面做一些组织工人工作。

有意思的是，也有一部分刚毕业的青年人选择加入官方的工会系统，一方面是为了了解它的运作，另一方面是想去影响和改变现在工会不为工人办事的现状，从而开辟一些做事的空间。不过因为后来官方工会知道有学生加入他们是“另有目的”，所以他们也开始谨慎聘请大学生，或者对大学生的背景进行更加严格的审查。那些已进入工会的青年人觉得受到很大限制，所以也开始慢慢离开，官方工会对青年人的聘用政策也转变为“只出不进”。

非左翼青年

与左翼青年不同的是，还有一些青年人在学生时代通过网络（主要是微博、微信、FB）或校内外的组织，接触到一些以建设公民社会为志向的 NGO 或个人行动者。他们被公民社会的理念所吸引，希望追求自由、民主、平等价值，进而参与这些机构组织的活动。在参与的过程之中，他们对劳工议题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积极寻找可以进一步参与的机会。不过相对于左翼青年来说，他们的组织松散很多，一般只会通过聚会、爬山、读书会以及共同关注的事件的方式来维系关系和网络。

他们之中有一部分人有自己的专职工作，在自己的工作里面也体验到公司对员工施加的各种压榨。他们会用自己的业余时间比较持续而深入地参与到公共事件之中。比如，他们会去工人抗争现场写报道，也会在劳工活动家被抓捕时参与到声援营救工作里面。他们也会与当地一些有影响力且仍然活跃的老一辈行动者有较多沟通和交流，从而获得一些资讯和支持。

另外还有一部分是仍然在学校的学生，这部分青年行动者会通过实习、兼职或志愿服务的方式参与劳工机构的一些协助工人处理个案的工作，比如工伤探访、法律咨询、为工人代写法律文书等，希望在陪伴和支持工人的同时，也能提升工人的权利意识。

三、官方的管控与压制

左翼青年

在经历过 2018 年佳士工学运事件后，高校左翼社团受到了严重摧毁，几乎可以用连根拔起来形容，很多耕耘多年的社团无法再公开开展活动。比如，北京大学的马克思主义学会因积极参与工运而被强迫改组；以校内工友为服务对象的中国人民大学“新光平民发展协会”则被暂停活动并被要求限期整改。

左翼青年也被公安和学校作为重点关注对象予以全方位管控。2019 年 4 月 28 日五四青年节前夕，五名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会成员（邱占碹、焦柏榕、孙嘉言、李子怡和王瀚枢）前往亦庄工地打工体验劳动。然而在第二天早上八点左右时，全部人都“被失踪”。不仅如此，左翼学生还遭到官方的进一步刑事抓捕。本科就读于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研究生就读于中央民族大学的毕业生杨郑军于 2019 年 1 月 8 日晚间在广州住处被 12 名警察强行闯入押走，随后关押在深圳市第一看守所，8 月时被批准逮捕。除此之外，约谈、要求删除在社交媒体发布的文章和言论、进行思想教育等管控手段也都继续得到沿用。

高校也越来越普遍地使用科技手段和学生力量去实现其管控的目标。比如，校外人员进出校园需要刷脸或身份证件；学校普遍启动“学生信息监督员”制度，利诱学生充当眼线，以此来收集教师和学生的言论及思想倾向；在教室里安装监控摄像头已经是标准配置，期望通过这个来获得教师发表不当言论的证据，制造人人自危的恐怖气氛来逐渐禁锢教师和学生的思想言论，仅 2019 年被学生举报且被惩罚的教师就已经超过了十人。对高校社团、社团学生领袖、高校教师和学生的打压制造了一种寒蝉效应，使得正常的学生活动变得愈加地下化。

劳工机构

在当前的中国，只要有一点点影响力和群众基础的独立组织或机构都会遭到官方的打压。在 2019 年被抓捕的劳工人士当中，被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名关押的人数比过去都要多。与过去常用的“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名相比，虽然两个罪名的量刑幅度差别不大，但是前者对人的威慑力更大，因为当局可以以“涉嫌危害国家安全”为由长期剥夺当事人会见律师的权利。而在公众传播上，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的说辞特别能引起一些“不明真相”的群众信以为真，可以充分调动“小粉红”高涨的民族主义热情。

有行动者在参与一段时间后因为感觉到无力而选择离开。其中的具体原因是多方面的，比如对行动是否有意义、能否真正带来改变产生怀疑，每天面对的都是很沉重的话题，家人的不理解，对安全的考虑和自己身体精神健康的担心，跟同龄人相比经济状况差距较大等等。但也有一部分行动者因为深度参与对劳工人士的声援工作后，逐渐理解和认可了他们工作的价值和理念，从而在声援工作告一段落后选择进入劳工机构工作，或者成立新的机构扎根工人社区，继续帮助和支持工人。

尽管官方对劳工行动者的打压在升级，产生的影响也不见得全是负面。比如，大家在公共空间里直播、讨论、诉说自己被打压的经历，以此让打压的行为变得可见，这会让一些“沉睡”的人觉醒过来，也因此可以联络到一些有共同遭遇的行动者。另外，打压也让年轻的行动者亲自见证和体验这个社会体制的荒谬和不公。之前他们以协助“弱势群体”的动机参与到劳工运动，但那无论如何也是他人遭受了不公，而当打压真正降临在自己身上时，那种真真切切的体验会转变为成长的催化剂。

四、青年劳工行动者的困境和出路

客观上来说，青年人在劳工议题上耕耘的空间是巨大的，因为中国有 2.8 亿的打工者，600 万的尘肺职业病人，每年因工伤切掉的手指超过 4 万只，每年大大小小几千起的工人集体行动。在劳资矛盾没有得到缓和而工会又不能有所作为的情况下，无论是个人还是组织，只要我们愿意，总是能找到参与的机会。

但是，由于官方从 2015 年开始持续对劳工机构打压，这些机构为了规避风险，也有受到资源收缩的影响，很多劳工机构不再能够以组织的名义开展工作，而是采取化整为零的方式以个人名义、非公开的形式。或者，即便能继续以组织名义开展工作，这些机构也在工作内容和重心上有所调整，去掉一些认为“敏感”的议题，或者只做不宣传。这使得劳工机构更加边缘和地下化，也更加孤立。

这样的变化也导致劳工机构和青年行动者互相看不见，青年行动者的参与途径比以往减少，获取相关资讯变得更加困难，无形之中为青年行动者的参与增加了障碍和门槛。所以未来可以尝试努力的方向可以是让青年行动者和劳工机构多一些正式或非正式的联结。

另外一个发展方向是加强劳工议题与其他议题的联合。一直以来，劳工议题都是中国社会运动中“边缘的边缘”、“底层的底层”，再加上“左右之争”，使得本来就很少人关注和参与的情况变得更加严重。另外，劳工议题的行动者很多是工人出身，学历、资源、论述、创新都不及其它议题的行动者那么强，思想也没有那么开放和多元，接受新事物和适应变化的能力相对来说比较弱，所以，未来如果能搭建更多平台将劳工议题和其他议题的行动者联合起来多一些交流和学习，那将有助于劳工议题的行动者从自我封闭的隔绝状态中走出来，也可以有能力和发展上的提升。

第四部分 中国青年性少数行动者报告

作者：中国同志运动参与者

2019年11月，18万中国LGBT+社群参与《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法律修订，提出“同性婚姻合法化”的法律意见。大量青年行动者参与到社群线上提意见、线下寄信的行动动员中。而另一边，12月初进行的一次行动者自我照顾工作坊中，26名参加者中有22名青年行动者提及在过去一年曾被“有关部门”直接约谈至少一次。

这两个事件，同时反映了目前中国大陆性少数青年行动者的现状与处境。一方面是外部政治压力越来越直接地触及到年轻行动者，不少行动者在刚进入行动领域的初始就须面对强大的政治压力；另一方面，青年行动者依然活跃开展线上及线下的集结行动，在有限的公民社会空间中努力尝试，动员社群参与或进行线上论述。这些较量与博弈，在过去的一年让行动者感到艰辛、无力与孤独，同时也让他们在一有机会突破时更为紧密和团结。

本报告将对青年LGBT+行动者的行动类型和组织形式进行总结，梳理他们面临的主要挑战，并提出未来可以支持青年LGBT+行动者发展的方向。

一、青年LGBT+行动者及组织

LGBT+青年行动者大致可分为两类，一是在校参与校园同志小组的大学生，二是参与到民间同志机构志愿者的大学生和刚毕业不久的在职人士。两者有交叉，也有过渡，当然也有些完全并不重合。

China SOGI Youth Network于2018-2019年访谈了中国大陆50个高校同志团体的核心成员，梳理出目前校园青年LGBT+小组的现状与特点。这些团体主要以某一高校独立运作的学生小组为主，有14%为跨校的联合小组。80%成立于近5年内。从地域上看，主要集中在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和武汉、西安等城市。该报告显示，这些青年小组的核心成员多在20岁左右，就读大二和大三的学生居多。而大学专业分布较广，以人文社科专业较多，尤其是社会学与法律专业，当然其中也不乏工科生。关于性倾向与性别认同，这些核心行动者以顺性别为主，男同性恋占32%，女同性恋为男同性恋的一半，但异性恋也占有16%，也有不少参与者自我认同为酷儿。

除了高校同志团队外，也有不少青年行动者通过民间公益机构的平台参与LGBT+议题的推动，包括在校大学生及刚毕业不久的青年人。这些年轻人以志愿者、实习生或全职工作者的方式，参与NGO的具体工作。在校大学生参与到NGO的平台通常有两种情况，一是所在学校没有LGBT+学生小组，所以一些较有想法的年轻人会主动去寻找NGO的参与平台；另外也有一些是因为被NGO关注和推动的议题方向、工作内容所吸引，因为这与校园同志小组的工作内容不同，比如专门做跨性别议题的NGO、做法律倡导的NGO等，这些NGO为具有相关特长或兴趣的青年人提供了专业的平台。

基于高校的 LGBT+青年团体最早成立于 2005 年前后，当时中山大学的彩虹社及复旦大学的知和社为最早一批在校园开展性/别活动的学生团体。但近 5 年来才是高校同志小组较多成立与发展的阶段。校园学生团体的成立与民间同志组织的发展息息相关。一方面，同志 NGO 举办青年人、志愿者培训，不少青年行动者在参与相关的青年行动者培训后，在本学校发起同志学生小组。另一方面，由于本校有老师正在开设性/性别相关的课程（NGO 与老师合作的课程或老师自己开展的），得益于该课程和老师的 support，大学生们发展出青年同志小组。再者，同志 NGO 的倡导工作和公益行动是公开且可见的，这使得青年人有参与同志运动的途径，从而选择以志愿者或实习生的身份参与到运动之中。

但也是从十多年前同志青年团体在高校成立后得到广泛关注时起，校园同志团体因“青年”+“LGBT+”的双重身份而一直受到学校打压，发展较为艰辛。根据 China SOGI Youth Network 的访谈，在 50 个高校同志小组中，不到一半的同志小组在校园里能与其它学生社团一样顺利注册，多数小组与同志 NGO 一样无法注册成同志社团，甚至有两个同志小组在注册为学生社团后被强制注销。由于没有社团的“合法”身份，他们在校园里开展活动遇到较大的阻力：一是不能公开在校园里招新，新成员的吸收只能通过网络进行或通过参加活动而加入；二是不能借用学校的教室举办活动，只能借用其它社团名义或在校外进行；三是不能在校园中举办较大型的活动、讲座等，否则会面临被辅导员或团委老师约谈的风险。

即便如此，同志青年小组仍以不同的形式组织校园中的性少数学生及友好支持者进行运作。小组的活跃成员少的不足 5 人，多的达至上百人。多数社团的运作方式是一年年换届，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因此，活跃成员多为大二、大三年级的学生，只有少数几家跨学校的同志小组的负责人仍为较高年级的学生或已毕业的人士。

二、青年 LGBT+ 行动者的行动

近两年，随着公民社会行动空间日益收缩，许多 LGBT+ 公益机构的活动受到较大影响，各机构均采取较为保守的行动策略，低调地开展工作，少有过去几年较公开的倡导行动，青年行动者的参与缺乏成熟的平台。然而，青年 LGBT+ 行动者及其团队在面对各种外部压力的情况下，仍大量坚持着校内外的行动组织及参与，活动内容涉及性别研究、社群服务、公众倡导等多样化的工作。

在过去，提高同志的可见度是校园同志小组一个很重要的目标和定位，举办的活动包括在学校里扬彩虹旗、骑彩虹自行车，在“517 国际不再恐同日”等特定日子里做大型的 pride 活动等等，以此来引发校园师生对于性少数话题的关注。但这几年，这类活动往往会给学生带来较大风险，或被辅导员约谈，或被学校叫家长。比如，扬彩虹旗在 LGBT+ 运动里曾是很重要的活动，但如今，学生一举彩虹旗就会被学校盯上，从而面临后续无法开展其它活动的后果，因此，校园同志小组的活动也转向了更为地下和无声息的（不喊口号式的）社群线下讨论与聚会。一青年组织者在 China SOGI Youth Network 的报告中说，“要把彩虹旗的理念体现在每一场线下的社群活动中让大家参与讨论。”

目前，不同青年 LGBT+ 小组的工作主要包括同志学生社群发展、公众教育/知识普及、调查

研究、议题倡导、学生团体网络支持等。

同志学生社群发展包括组织 LGBT+学生的线下聚会、交友、主题沙龙等，比如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的同志小组曾联合举办意定监护分享会，帮助学生了解目前对同志社群来说重要的法律。另外，也有个别性少数学生小组提供男同志 HIV 健康服务、热线陪聊和心理咨询服，比如华中科技大学和北京大学的同志小组均邀请过校内心理咨询老师给成员带心理支持小组。

公众教育/知识普及包括面向高校学生和面向中学生的性/别教育课堂，包括线上和线下两种方式，NGO 生产的一些认识同志和校园欺凌相关的资料也在高校同志团体中得到使用。在微信公众号发表文章是多数青年团体使用的方式，比如山东一同志小组经常结合与同志社群相关的社会事件进行撰文论述，从而引发公共讨论。北京某同志小组发挥自身成员的长处，写出“酷儿六讲”普及酷儿理论相关知识。还有长沙的同志青年行动者会选择在目前学生群体中流行使用的“QQ 表白墙”中推广 LGBT+ 的相关信息，已取得了较好的关注量。另一种较多尝试的行动方式是青年人参与性/别教育课程的分享。一些青年学生团体通过开展同伴性教育的方式，将性别多元的知识内容放进性教育中，面向大学生及中学生开展同伴性教育。也有较多的青年人通过同志 NGO 的平台作为志愿者参与到性别教育的过程中。他们在 NGO 的带领下进行性别教育相关的学习和训练，并进入中学课堂去分享自己的生命故事和性别多元知识。

开展性与性别相关的研究是 LGBT+青年近几年新发展出来的工作方式。他们有的在学校开展学生出柜及校园欺凌相关的调查，有的在老师的带领下做性别理论相关的学习和研究，还有的利用法律知识参与到法律倡导方面的研究。这些研究有些偏学术，也有的会将研究转化为文章发表，从而推动进一步的公共讨论。比如同志组织在推动就业歧视法律案件过程中，法律专业的年轻行动者曾组织系列相关法律比较研究，通过撰写法律文章的方式推进议题的公共讨论。这是他们突出的优势。

青年人在网络公共讨论的推进上也发挥了相当大的能量，其中较为核心的行动者多是经过 NGO 训练的或与 NGO 有关联的年轻人。比如，2019 年 4 月，新浪微博屏蔽了#LES 相关议题，许多年轻人在网络上讨论、转发。与此同时，在一次工作坊的行动讨论中，来自某同志机构的志愿者策划了针对该微博事件的行为艺术，用口红在嘴巴上划 X，以此来表达被噤声的女同性恋，并在网络上号召大家参与。这一行动获得了非常高的网络关注度和社群参与度，而后另有志愿者持续撰写她们在这些被屏蔽的网络空间里的故事，这一系列行动为推动该抗议事件的发展带来了许多行动的力量。类似的倡导行动有两个特点，一是网络聚集了非常多的年轻人都参与，他们长期浸泡在网络中，擅长网络技术，在虚拟的世界中敢于发声；二是利用个体行动介入公共讨论并有意识地带动更多人参与的年轻行动者多是经过 NGO 训练的年轻人。

再介绍两个议题倡导的青年行动案例。例一，在过去几年的“反教科书污名”行动中，在 NGO 的推动下，多地青年小组形成行动网络，并在各自小组所在的学校持续开展“教科书去污名”的行动。他们有的开展本校图书馆书籍描述同性恋的调查，将调查结果反映给校方，

并要求更换正确描述同性恋内容的图书；有的则向教务处及老师进行游说，并成功向全校师生发送了正确了解性少数群体的内容；还有的与编者、出版社沟通，指出错误并要求改正；也有的成为了诉讼案件的当事人。在这一系列的行动中，各行动小组均在有明确目标及策略的规划下开展行动，与偶发的一次性公共活动有所不同。例二，在 2019 年 11 月的《民法典》同性婚姻倡导行动中，大量参与动员的志愿者均是在各同志机构充当志愿者的年轻人。他们一方面利用自身在网络上的传播技能进行网络动员，另一方面在线下带动更多普通的在地社群参与，最终带动了 18 万 8 千多人参与到该立法过程中。这在中国同运参与立法的历史上是重大的突破，许多参与者表示，这是他们有生以来第一次参与中国的立法进程。这些有组织的青年行动，显然得益于同志 NGO 在幕后有规划的推进。

最后一种同志青年的行动内容是开展各组织的网络搭建、提供资源支持以及能力建设。由青年人支持青年人的方式来开展工作，是几个青年网络平台团体的工作定位。有的团体是具有官方背景的性教育网络，它们可以筹集到较多资源去发展性教育的青年人行动网络，并为该网络成员提供培训和资源支持。另有团体以 NGO 的形式开展工作，以促进青年团体的交流、学习和能力建设为工作内容，并发布青年 LGBT+ 团体的现状报告，以此推动与他们自身发展相关的共同议题。

近年来，随着同志可见度的提高，性少数年轻人出柜的年龄不断往前移动，许多中学生开始接触同志公益成为志愿者甚至月捐人。大部分年轻的同志习惯在网络上发言参与讨论，虽然也面对家庭及现实生活中的压力，但因其日常生活的氛围（尤其在城市中）相对宽松，他们也勇于向前走一步而参与到运动中来。这也意味着，同志运动的可见度，他们能接触到性别运动信息和知识的程度，非常影响这些年轻人的行动参与。

三、青年 LGBT+ 行动者的挑战

同志运动本身受到的限制影响了青年行动者的参与

同志运动对青年行动者的影响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第一，运动提供的平台。对比过去两年台湾因为婚姻平权运动的大规模动员，许多年轻人参与到运动不同层面的状况，过去两年中国大陆环境的收缩则让各同志 NGO 无法开展较大规模的行动。许多同志机构转向较内部和小规模的工作方式，这一方面无法将同志公益相关的信息传递给更广泛的青年人群，另一方面即使有年轻行动者希望进入同志机构有更深入的行动参与，他们也未能有较广阔的平台和空间可以发挥。

第二，运动理念和路径。要开展权利导向的工作，在目前的运动环境之下不容易，这一方面限制了同志青年的行动内容和对运动的想象，另一方面对性少数遭遇歧视的结构性根源，也难以开展讨论，真正进行回应并推进改变。

第三，议题推动的深入及持续性。在草根行动空间有限的情况下，社会创新等新潮的行动方式得到较多空间和年轻人的目光，但这些行动方式往往回避了性少数群体面对的结构性问题。对于需要持续深入推动的议题，年轻行动者中间也缺少更踏实行动的氛围和动力。在有众多

选择的环境下，年轻人着重新奇的体验，无法对同志议题进行持续深入地参与。

公民社会环境的收缩对行动者控制风险的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对于青年行动者来说，管控的压力主要来自于学校、家长和安全部门。学校主要通过辅导员、团委、党委或保卫部进行干预。许多学生组织没有风险评估和预防的经验，社团刚成立组织了一次活动就被学校盯上。这不仅使得社团进入学校的重点监控名单，活动受限，而且也会让社团成员在没有准备的情况下承受较大心理压力。如果在学校这一关可以成功应对，那学生身份的好处是学校可以成为他们免受直接外部压力的避风港；但如果处理不好，那这也会让他们面对更多来自安全部门或家庭的压力。

过去几年年轻同志行动者面对各方压力的例子并不少见。比如，起诉教育部的大学生秋白，一开始辅导员为了限制其行动而多次谈话劝说，未果之后告知秋白母亲其女儿的同志身份并期望她阻止女儿行动。这一行为给秋白带来了巨大的家庭压力。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广东另一高校的同志学生身上。在参与了同志学生团体的行动后，辅导员及团委老师将其限制在课堂中，并连夜叫家长从另一城市乘坐飞机将其带回家，最终导致该学生无奈退学。来自广东外国语大学的某名拉拉行动者在毕业时开展公开接吻的行动后也引发学校关注，学校告知家长，最终导致家长报警，为原本在 NGO 做志愿者的学生带来了较大压力。面对这些出柜、退学和政治等多方面的压力，许多年轻行动者无法面对，长期处于担惊受怕中，有的最终选择放弃运动参与。风险评估越来越成为了青年同志行动及其团体开展每一个行动必不可少，甚至最为重要的考虑因素。

四、青年 LGBT+ 行动者的需求和出路

打开运动想象并落回脚下持续行动

面对有限的空间，我们需要有更多关于可能性的想象。这些运动的想象，可以是来自视野的开阔、看到各种行动的可能性，也可以是打破原有无法行动的思路、看见行动的空间和目前仍未触及的可能性。但打开想象并不意味着抽离实际地开展行动。不抽离实际在这里有两方面的意思，一是对目前中国大陆同志面临的问题有较多认识，对正在进行的大陆同志运动有所了解，以及对目前我们所处的社会及政治环境有所思考；二是对自己感兴趣或需要回应的议题有较为深入的分析，并以持续开展行动的心态进行规划和行动。这些思路，也间接地回应了风险控制方面的需求。不是说避开有风险的工作不做，而是从长远的工作规划出发，决定哪些是目前需要做的，哪些是不必要的冒险。当然这是一个过程，行动者在行动的过程中学习和进一步理解所做的议题，亦是一种学习方式。持续性地、脚踏实地地开展细小的行动，在当下的环境之下是值得被鼓励的工作理念。

搭建青年行动者与同志 NGO 的互动合作

如前所述，同志 NGO 的发展与青年行动者的参与息息相关。同志 NGO 在不同议题上的持续推进，有利于青年行动者的行动，从而也可以更有效地推进议题的改变。若青年行动者

的行动与 NGO 的工作和议程相结合，能使行动本身发挥更大的效果。而从青年人培养的角度来说，NGO 与青年人的互动合作更有利于青年人持续地得到支持和发展。搭建青年行动者与同志 NGO 的互动合作可以通过实习生项目、mentorship、合作行动等方面进行。

赋权工作能力的学习

除去如何进行行动策划的能力，在目前充满冲突、割裂的社会及运动文化下，如何开展对话、如何协作讨论及聆听、沟通，都是开展相关行动的重要能力。学会在社群工作中进行赋权式对话和小组推进，将很好地帮助青年行动者成为更有领导力的运动组织者。

创造在一起的机会

在上面列出的几点建议中，并没有专门关于风险控制的内容。当然，基本风险评估的技能是需要的，但不必陷入该问题的纠结中。除了前面三点都是很好的回应外，最后这一点——创造更多大家在一起的机会也相当重要。压力环境让行动者变得更加孤独和孤立，行动者之间相互的陪伴显得更为必要。找到更多同路人，可以使年轻的行动者更有活力和动力。而一旦有机会在一起聊天、讨论，很多可能性将自然发生。

【完】